

陆仲光与高宏的谈历史转折点时的人和事

(2020年8月24日)

高宏的于8月23日晚转发华师附中校友吴军捷关于回忆改革开放初期广东“四大才子”的微信给老同学陆仲光，两人引申开来在网络上进行了一些讨论，重点是1976年国务院务虚工作会议的相关人和事。下面是两人讨论的部分内容——

陆仲光：

吴军捷？知道这个人，是附中老高一的。他应该不是“主义兵”，也不是“南海兵”，好像后来是附中“同心干”战斗队的。

曹淳亮？不认识。他也是附中老高一的，但没有印象。

黎元江，只有短期接触。批林批孔运动后，加上评儒法两条路线斗争、评《水浒》、批《三字经》、批《弟子规》等，全国掀起落实毛主席“要学习理论”指示的高潮，各大城市和大企业普遍成立了工人理论小组。一九七四年，在广州市总工会组建下，成立了广州工人理论小组，负责人是刘旭栋，我成为第一批成员。黎元江是七六年进来的。

于幼军、朱小丹？我不认识，只是后来知道他们。

哦，陈保这小子居然爬上了省出版社总编辑？真是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啊！

这家伙我认识，共过事，我的挨整也是拜他所赐。

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帮前，广东省出版社要出一本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书，组织一个四人的写作班子。陈保是召集人，出版社来了一个编辑，外加一个东莞农民，还有我，共四人。我们在当时的东莞党校一起写作。

写了十几天，突然有人把陈保叫回广州。第二天他一回来，就说要紧急传达中央文件，就是那个华国锋打倒四人帮的中央文件。当我听到文件中华国锋说：毛主席的指标是“照过去方针办”，四人帮却把它篡改为“按即定方针办”时，脑袋马上嗡的一声炸开了。“按既定方针办”，不是你华国锋在计划会议闭幕式上传达的么？今天怎么突然成为四人帮的政变纲领了？我的脑海在剧烈翻腾着，不觉回想起当时会议的情况。

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中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国务院计划经济工作务虚会议，我作为工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广东省带队的是省委张根生书记，还有广东凡口铅锌矿的书记，省计委的一名处长，省外贸局局长和我，共五人是正式代表；张根生秘书和另一名工作人员是列席代表，一共七人参加了这个会议。这个会议是五月三十一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由毛泽东批准召开的。会议日程是两项：一是批判条条专政，二是调整下半年计划。

会议的最后一天晚上，即七月三十日晚，政治局全体成员接见与会代表，华国锋和王洪文在会议上讲了话。

华国锋在会议上的讲话，先是介绍了七月二十八日的唐山地震情况，接着就是传达毛主席的两条最新指标。一个是“按既定的方针办”，另一个是“国内问题要注意”。华国锋讲话是照着稿子念的。王洪文讲话没有稿子，但是很短。

接见结束后，大概半个小时，大会秘书处通知大家集中，传达整理后的华国锋和王洪文的讲话。秘书处的人念一句，我们记一句。完了，张根生又召集我们广东省的五个代表开会。让我一句一句念出来，大家对照记录。对完以后把所有错漏的地方都改正了。张根生还吩咐我，一回到广州，马上把华国锋的讲话交给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

我脑海还在翻腾着，以至于陈保传达完了以后讲些啥都不知道。陈保见我发呆，就走上来小声问：“华国锋是不是在计划会议上讲了‘按既定方针办’？”我随口而出：“是的”。他提高了调

门说：“华国锋讲的是山西话，你有没有听清楚？”我不以为然的回答：“我听不清楚，难道张根生也听不清楚？”他气急败坏地说：“四人帮篡改毛主席指示！”我没好气地说：“到底是谁篡改，我就知道了！”

陈保之所以问我华国锋是不是在计划会议上讲过“按既定方针办”，是因为在打倒四人帮前，也就是一九七六年八月十日，广东省委在中山纪念堂召开全省干部会议，林李明主持，张根生传达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张根生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就是“按既定的方针办”，即多了个“的”字。这是我们在会议上反复核对后的文字。另外一条毛主席指示是“国内问题要注意”。接着，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韦国清为落实毛主席的这两条最新指示进行了工作布置。可见，早在打倒四人帮前，广东的干部都知道“按既定方针办”是华国锋在计划会议上传达的毛主席指示。

这个会议的记录我还在，以后可以给你搞党史的时候作为原始资料。

从北京回广州的晚上，我马上把华国锋的讲话用复写纸写出五份：一份给市委，一份给广钢党委，一份给市总工会，还有两份自己留着。

第二天早上，即八月一日，我骑自行车去到广州市委，这天是星期天。接待室说焦林义不在。我说怎么办？张根生说要马上交给焦林义。市委接待室的人说好办。他把我的信封编了号，在记录本上登了记，又给了一个收据给我。里面写着收到广钢陆仲光交给市委第一书记焦林义的信，内容是华国锋在国务院计划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有日期，有公章。可惜我挨整时上交了，为此后悔了一辈子。如果这个收据还在，那就可以证明我手中华国锋的讲话时间，是在打倒四人帮以前的。

陈保传达粉碎四人帮文件的第二天，他别有用心地问我：“怎么看待四人帮？”我对他已经有所戒备，回应了一句：“时代所能抛弃的人物，必然是时代要抛弃的人物。”他点了一下头，接着

笑着说：“你总是能说出一些有哲理性的话来。”这样的话他说过几次。他赞赏我的文章，也是因为这些文章里总会有一些带哲理性的文字，他说这很难得。有哲理性的文字会使人回味，拓展人的思路。

写作组很快就解散了。我回到广钢后，已经开始有批判我的大字报，我见了都是一笑置之。什么我“有野心”，“向党伸手要官”，“想当车间主任”等等。有的也令我哭笑不得。比如说广钢曾专门派小车去机场接我，没有接到，原来我是“坐了四人帮的车去开黑会了”。实际情况是：我从北京回广州时，与张根生不是同一架飞机。张根生乘坐的飞机直飞广州，我乘坐的飞机是先去杭州，在杭州停了一个多小时后才飞到广州。下了飞机我是挤公共汽车回家的。

虽然有大字报，但我的工作和生活还是正常的。直到陈保的揭发信到了广钢后，广钢才真正对我立案，还成立了专案组，给我封的罪名是“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

广钢专案组给我展示了陈保的揭发材料后，开始时还没有关我，说是要给我个“机会”，我还是个“可挽救的对象”。他们要我抓紧时间主动交代问题。

不久，车间主任传达了市委书记梁湘的指示：“陆仲光一定开过很多黑会，一定搞过许多黑串联。陆仲光必须交代这些问题！”我对朋友说：“现在都不是有了证据才去整人，而是通过整人整出‘证据’来。”后来，这位朋友也挨整了，我的话被爆了出来。于是，我从“可挽救的对象”立刻变成了打击和专政对象。七七年春，全厂大会批斗后，我就被关起来了。

被关起来以后，我在思量是否还有劫后余生的机会。梁湘说我“参加开黑会”、“搞黑串联”，肯定是胡说八道！自己的事情自己清楚！他们肯定拿不到任何证据！真正的劫难是我“攻击华主席”。这是无法洗刷也不需要回避的问题。如果真的过不了关，我就干脆来个秉笔直书！

秉笔直书在中华文化是普受尊敬的。社会是复杂的。谁也难以受骗上当。但是一个正直的人，不应该歪曲自己亲眼看到，亲耳听到的事实，尽管你要为此付出代价！你华国锋就是在计划会议上说了“按既定方针办”！这已经是历史！我就是历史见证人！历史知识告诉我，所有篡改历史的人，最终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华国锋虽然贵为党的主席，也决不会例外！

其实当时我还担心另一个罪名，就是攻击汪东兴。省出版社不是还有一个编辑么？我同他住一个房间。在听陈保传达中央文件的那个晚上，我们也谈了很晚。我说：“毛主席不是说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秦始皇么？这下好了。中国不但有第二个秦始皇，还有第二个赵高！汪东兴就是第二个赵高！赵高是秦始皇的生前心腹。结果秦始皇一死，他马上杀掉秦始皇器重的太子扶苏。最后还来个指鹿为马。汪东兴也是这样！他是毛主席的生前心腹。毛主席一死，他马上就把毛主席的老婆和侄子关进大牢。历史真是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啊！”他听后笑了，并接着我的话题说：“汪东兴在林彪问题上已经是周身屎。他心虚害怕，来了个先下手为强，配合华国锋把四人帮给抓了。什么打倒四人帮，就是赵高杀扶苏！”

当时汪东兴已经贵为党的副主席。如果我们的话传到他的耳朵里，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

但是这件事只有天知，地知，我知，他知。我不说，他也不说，就没有人知！我坚持不揭发他，他也坚持不揭发我。我非常感激他。

把陈保与这位编辑相比，你认为谁的人格高尚？你会尊敬谁？

高宏的：

我一直认为，你有责任（是历史赋予你的），必须把七六年参加国务院务虚工作会议的实况写出来，也必须把广州工人理论小

组的主要工作写出来。

你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议期间的记录，那是无价之宝，是最原始的铁证，是研究这一重要历史的主要依据之一。

从七六年六月至十月底你被关押审查前的这几个月，是中国政局风云激荡的重要历史变革时期，你作为一线的亲历者，历经别人不可能接触到的人和事。趁现在记忆还没有完全蜕化，尽快执笔吧！这可真的是历史赋予你的责任呐！

高宏的：

七六年十月下旬，刚刚公开抓捕四人帮消息后不久，广东省冶金局根据上级指示成立大批判组，从局机关、广州半导体材料厂、广州有色金属研究院、广东冶金设计院共抽调四人，我从工厂被抽调到广东省冶金局大批判组。当时，我住在局机关招待所。

一天晚上，我俩见面谈了几件事：（1）你说，想不到华主席也会讲假话，指的就是那句“按既定方针办”。（2）你再次记述了国务院务虚工作会议概况，包括华国锋、王洪文、谷牧等人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以及十四名工人代表们的发言。（3）因为有十四名工人代表参加国家级会议讨论国家大事，当时，有人称此次会议开创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先河。会议快结束时，工人代表联名给毛主席写了致敬信。（4）你回顾了参加务虚工作会议回广州后，如何按照省市领导指示传达会议精神。（5）据政治运动的规律，你我都判断，你会被关押审查。（6）你表示被审查时，绝不讲假话。（7）我说，江青曾介绍看几本小说，包括《基督山恩仇记》。我刚借来看完，建议你看看。并说，无论遇到何种状况，都不能自杀；还应向基督山一样，利用一切机会学习，哪怕是在监狱里。你当场表态说，自己肯定不会自杀。一个星期后你还书，我俩简单议论了书中内容。大概过了两三天，你就被广钢专政了，过了几个月还被关起来。这一审查，就是两年。（8）你恢复自由后，简述了被关押的前前后后。（9）这次审查放你出来，我认为

最大的庆幸，是他们没有毁掉你在国务院务虚工作会议期间的记录，并还给了你。

这样一段历史，不仅仅是你个人的经历，而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件大事，决不能让它淹没。

陆仲光：

七六年七月三十日下午，李素文、姚连蔚、谷牧等同志接见我们十四位工人代表。谷牧副总理说：“华总理很重视你们的发言”；“过去我们没有想到，批邓要请工人来。这次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次为你们鼓掌！你们这次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有工人提出，想写封信给敬爱的毛主席，表达我们参加这次会议的心情。李素文、姚连蔚、谷牧都说好。李素文还说：“你们放心，你们的信我们一定会转给毛主席，毛主席一定会看到你们的信。”大家听了很高兴。

在讨论如何写这封信的时候，上钢五厂的王炳英提出：“这封信要写出一些特色来。对于今后工人怎样参加管理国家，怎样参加制定计划工作，提出一些积极的建议和具体措施。”他的提议，我和一些年轻人都是同意的，但甘肃兰州化工厂老工人路兴育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们工人同志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份，一定要注意谦虚。我们给毛主席写信，只能写我们对毛主席无限感激的心情，只能写我们今后怎样来报答毛主席。在信中怎能对毛主席提什么‘建议’、‘措施’呢！”也有的工人同意路兴育的意见。我说：“其实大家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没有什么分歧。我们给毛主席写信，主要是写我们对毛主席无限感激的心情。我们的信。毕竟文字有限，所以也要注意有特色。我看，我们的信就围绕我们工人代表能参加这次计划工作座谈会，我们今后怎样来关心国家大事这两个核心内容，以此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大家都同意了我的意见。

李素文和谷牧听了都表示热烈支持。最后，大家推举上钢五

厂的王炳英和陕西咸阳国棉一厂的王西京来主笔起草。

晚上，政治局全体成员接见代表结束后，十四位工人代表马上集中。王炳英念了给毛主席致敬信的稿子，有些工人代表听了不满意，主要是觉得文采不够，缺乏激情。经大家推举，山西五一机器厂的工人代表靳志忠和我负责重写。

我可以证明，工人代表给毛主席写信与江青没有任何关系。

至于后来有大字报说政治局全体成员接见工人代表结束后，江青没有走，私自招见了十二位工人代表。我完全不知道此事，被审查时，我也没有交代过此事。

参加会议共有十四位工人代表，江青单独接见了十二位。可见还有两位没有参加，这两人就是我和山西五一机器厂的靳志忠。由于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地震，代表们都离开了所住房间，所有行李都被搬到大厅。会议秘书组还通知，一但有警报，大家都要尽快跑到草地上。所以，那时的场面比较混乱，想要找齐人是不容易的。何况我们躲在某个空房间里，正在紧锣密鼓地起草给毛主席的信。所以，我没有与江青再见面。

动笔前，我和靳志忠商量。我说，“过去的计划会议，都是急急忙忙讨论今年或明年的计划，对去年或前年的计划，没有认真进行检讨。我觉得，计划工作是很容易出官僚主义的。应该有一种制度对计划工作进行反思和检讨。我想对毛主席提建议，由全国总工会组织工人理论组对上一年计划工作进行检查。主要是检查上一年的计划制定有没有错漏，在计划执行的过程中有没有违反纪律的现象。办法是通过调查研究、专题研究。如果总工会的力量不够，还可以同教育革命结合起来。让清华、北大的教师、工农兵学员一起来做。目的是为制定新一年的计划，提供经验教训。”靳志忠说：“你的想法很有意思。不过，我认为现在不是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华总理的讲话强调‘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实际上就是要强化下级对上级的服从。人家国家计委主任一般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总工会主席

最多是个部长级。下级去检查监督上级，行得通么？到时人家说这是国家机密，就可以把你工人踢出去，你还怎样调查研究？”

我一听，觉得他分析得有道理。心想这次开了头，请工人来参加计划会议，又有好的效果，以后的计划会议，都会有工人参加的。不如回去慢慢把这个问题想深、想透，等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提出来。所以，我给毛主席的信，也没有提任何建议。

由于地震，所有代表都要在三十一日离开北京。吃早餐时，我找到李素文，把王炳英的原稿和我的修改稿一起交给她。李素文还再三表示：“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你们的信交给毛主席！”

高宏的：

自从六九年七月，我们从华师附中所谓的高三（我俩是六八年十一月从附中初三直升高三）毕业后，我去了海南岛上山乡下，你被分配到广州太古仓码头当了搬运工。

七〇年秋，我父亲的审查结束。年底，我走后门当了兵。七六年四月，我复员，六月进了工厂。

七一年五月你哥哥陆焕光在广钢指挥“一步炼钢法”，因钢炉爆炸牺牲。不久，你调进广钢“继承哥哥遗志”。那时给你哥哥的烈士证书还是国务院颁发的，是最高级别的了。

记得批林批孔后，你还进了广州工人理论小组。

那几年，我们俩一直保持密切通信往来。里面谈了那个年代的很多事。

大约十多年前，我将你给我的信都还给了你，并建议你从我俩的“两地书”中追寻历史故事。此事，你还没有做。

陆仲光：

再三声明：我与江青毫无联系！更没有写效忠信之说。因为我对他们也有自己的看法。

比如说姚文元。他主持《红旗》杂志的理论文章，我就认为

不行。在计划会议期间，我也与《红旗》杂志两个编辑过过招，搞得他们很狼狈。

比如张春桥。我认为他应该在六七年二月逆流时理直气壮顶回去，在理论上阐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意义。如果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他就是在大风大浪中冲杀出来的英雄。那样的话，毛泽东就会放心把党的主席这把交椅交给他而不是华国锋。可惜，他像懦夫那样一言不发。正是看到张春桥的懦夫性格，所有人都看不起他。

林彪之所以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对张春桥发难，就是抓住了他的懦夫弱点！其实，你无法向我指出，张春桥具体做过哪件坏事，具体害过哪个人。正是他的懦夫性格，葬送了他自己！毛泽东也绝不会找一个懦夫做党的主席。

我之所以尊敬江青，是她完全没有懦夫性格。敢于在法庭上顶撞法官。只是可惜，她的文化水平太低了，总也说不出有份量的话来。上天给了江青一个做季米特洛夫的宝贵机会，可惜江青没有季米特洛夫的智慧！毛泽东也很清楚，她完全没有武则天那样的才干！所以毛泽东不同意她做党的主席。

我之所以讨厌粉丝。是因为一有粉丝，你就必然会被媚俗。我现在自己看书，自己思考，非常自在。

高宏的：

正因为有很多误传，你才更应该把这段历史写出来！

陆仲光：

这件事太复杂。不方便在网上谈。还是见面再细说吧。